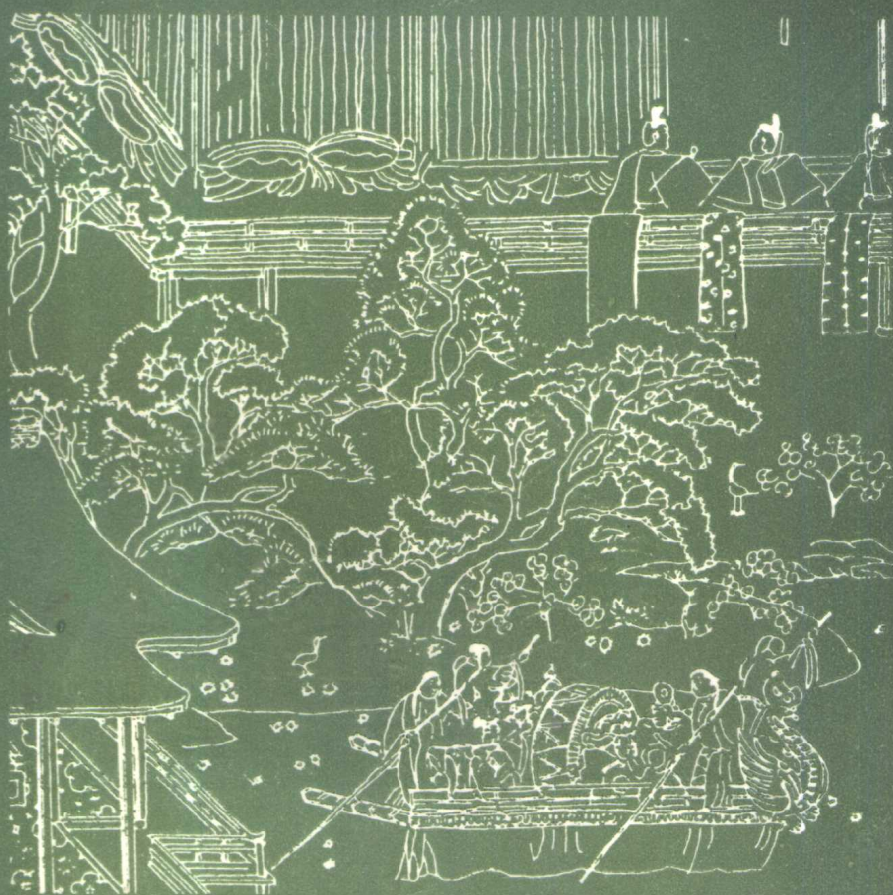


A 建筑文化论丛
ARCHITECTURAL CULTURE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TRANSLATE AND RESEARCH
OF GARDEN DESIGN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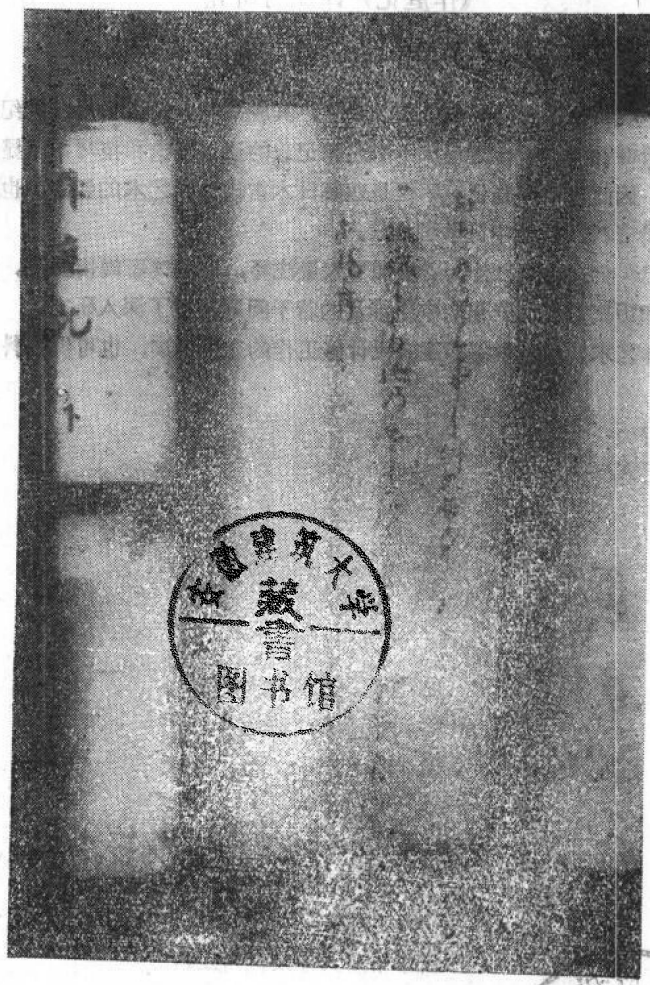
张十庆



天津大学出版社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张十庆 译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012号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内 容 提 要

《作庭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本造园学专著，其成书时间约当公元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叶，远早于我国造园学名著《园冶》。《作庭记》所阐述和记载的造园理论和技巧，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深刻影响。因此，《作庭记》不仅是理解日本古代造园艺术的钥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发展过程的珍贵资料，备受中日学者推崇。

本书除将《作庭记》全文翻译之外，还增加了大量注释，以利读者阅读理解。作者同时也结合中日两国造园艺术理论和历史对《作庭记》中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适合从事园林艺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等工作的人员阅读，也可供社科、人文、艺术工作者及一般读者参考。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张十庆 译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河北昌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¹/₁₆ 印张：5¹/₂ 字数：134千字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618-0476-8

S·2

定价：6.80元

序

《作庭记》是日本古代一本造园专门著作，其时约当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后期。作者不详，有谓为橘俊纲（1028~1094）。此书在日本造园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很受日本学界重视，历来考证、注释者甚多，中国学界也早知此书。已故建筑学家童寯先生生前多次指出《作庭记》的学术价值及其中表露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热烈期待它的中译本的问世。很遗憾，在他1983年逝世之前，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作庭记》不仅是理解日本造园特色、形成源流的钥匙，并且还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国造园手法的佐证。日本造园往往更多具有象征手法和宗教（主要是佛教的禅宗、真言宗和密宗）色彩，这或许是中国造园史上缺失的（或受忽视的）一环。以往我们目光囿于文人园，这是为现存遗物实证和文字书画资料所局限而致。事实上中国的寺院禅庭，不乏林泉清幽、萧疏淡泊的环境情趣，散见于史籍咏篇者亦复不少。这同样是有待发掘整理的宝贵遗产。

张君十庆，现为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成员。曾于1988年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留学一年有半，受业于日本古建权威浅野清教授门下。留日期间，遍访各地名胜古建筑址，阅读文献，收集大量资料，以为从事中日两国古代建筑文化交流的研究准备，其中包括对《作庭记》的研究准备。他于1989年归国，在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后，仍留校继续从事东北亚建筑文化研究，随即进行《作庭记》的译和注。译与注，即文字翻译与内容研究，二者相辅相成，无研究即不可能真正达其意。读者从译者的大量注释中可见他用功之深、力求使读者易于理解的用心之切。经张君的辛勤努力，虽不能说这译本已臻尽善尽美，而是期待读者批评指正之处甚多。但我认为至少可以说，这篇译本已颇具可读性，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了。

一事之成，来之不易。或可以此告慰童老在天之灵。是为序。

郭湖生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1992年1月25日

目 录

序

上篇《作庭记》研究	(1)
一、《作庭记》在东亚造园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1)
二、《作庭记》的内容构成	(4)
三、《作庭记》的作者、系谱及成立年代	(7)
四、《作庭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10)
五、《作庭记》与寝殿造庭园	(22)
六、《作庭记》的思想源流及文化背景	(32)
七、《作庭记》的造园技术	(37)
下篇《作庭记》译注	(45)
卷上	(45)
1. 立石要旨	(45)
2. 立石诸样	(50)
3. 汀形诸样	(52)
4. 岛姿诸样	(53)
5. 立泐次第	(54)
6. 落泐诸式	(57)
7. 遣水事	(59)
卷下	(63)
8. 立石口传	(63)
9. 立石禁忌	(66)
10. 树事	(71)
11. 泉事	(73)
12. 杂部	(76)
插图来源索引	(77)
主要参考文献	(78)
后 记	(79)

上篇 《作庭记》研究

一、《作庭记》在东亚造园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作庭记》是一部形成于日本平安时代（781~1185）后期的造园技术专书。其内容广泛而全面，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平安时代后期寝殿造庭园的形式及其造园技术，可以说是日本造园发展至平安时代后期，其技术的积累与总结，是日本乃至东亚造园史上，关于早期造园的一部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文献。作为东亚造园史上最早的一部造园技术专书，《作庭记》有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自从中国的造园随佛教的传播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全盘地接受了中国的造园技术，成为东亚造园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并在唐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其造园至平安时代趋于成熟。这是日本造园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成立于平安时代后期的《作庭记》，正是这一时期日本造园走向成熟的产物和反映。《作庭记》所反映和代表的这一时期的造园技术，构成了日本古典造园的传统，成为其后日本造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源泉。庭园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和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最显著和最典型的特征。以《作庭记》为代表的日本古代造园文化，典型地反映了奈良至平安时代日本文化的性质、特点及背景。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是日本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和象征。

日本在中世（1184~1572）之后，尤其是在近世（1573~1867），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造园书，在诸多造园书中，《作庭记》不仅年代最古，而且最具价值。自平安时代后期《作庭记》出现之后，再未出现过可与之相比拟的优秀之作。《作庭记》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不但影响了其后的造园实践，而且对后世造园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作庭记》能够流传至今，也充分显示了其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以后，《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日益为日人所珍贵和重视，尊为国宝。《作庭记》的研究，随之也成为日本造园史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研究日本造园史者，没有不读《作庭记》的。日本学者认为，《作庭记》反映了日本古典造园的精髓，是日本造园传统的基础与象征。并就《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指出：作为日本造园之传书，《作庭记》具有最高的价值（森蕴《作庭记的世界》）；即使称《作庭记》是古往今来世界庭园艺术的金字塔也不过言（同上）。也有的指出：《作庭记》才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造园专书（木村三郎《作庭记新考》）；《作庭记》可称为造园之经典，日本庭园技术的至宝（斋藤胜雄《图解作庭记》）。《作庭记》成为日本造园史研究的经典文献及基础史料。早已湮没的日本早期造园的面貌，正是通过《作庭记》及相应的考古发掘，才逐渐得以认识。日本造园史上造园技术与风格的演变和发展，也正是借助于《作庭记》的研究，才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可以这样说，对于认识和理解日本造园的性质与特色，

《作庭记》是一个关键。

在日本,关于《作庭记》的研究,不仅限于造园界,在历史学、建筑学、美术史等的各个领域,亦极受注目。1976年英译本《作庭记》的出版,更使得《作庭记》广为世界所知。

作为东亚造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造园,对于中国造园史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历史上中日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注定了中日造园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日造园文化比较研究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史料。另一方面,从中国造园史研究自身的角度而言,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中国造园体系的全面、整体的认识,也极具意义与价值。其不但有助于认识中国造园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影响和发展,同时借助于对域外从属于中国造园体系的造园史的研究,反过来对中国本土造园史的进一步认识和解明,也大有益处。中日造园史的比较研究,当属中国造园史研究上的重要一环。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对于中国造园史(尤其是早期)的研究,是一极为重要的参照和补充,《作庭记》的研究,当可视为与中国造园史研究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中日间文化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学者们早就指出,二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日本从隋唐时代直接输入中国文化以后,历宋、元、明、清,凡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技术风俗,或迟或早,没有不复演出现于扶桑三岛的。所以日本文化学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延长。”⁽¹⁾造园文化也同样如此。

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造园,两千年来,其发展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然留存至今的都只是些明末清初以来所营造之构,代表和反映的仅是造园史上晚期的风格。故今日我们所能直接见到和了解的园林及其风格,仅是中国古代造园发展长河中极小的一部分,反映的也只是造园高峰时期灿烂的造园艺术的余辉,远远代表和反映不了造园发展的全貌,尤其是反映不了早期造园的技术与风格。二千年来中国造园的发展,前后风格的演变甚大,故若仅以明清园林所反映的晚期造园风格去推测早期的造园及其风格,则势必导致偏颇。遗构的湮没,史料的缺乏,使得对早期造园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成为中国造园史研究上的难点及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若放眼于以中国为核心及母体的东亚造园体系,尤其是通过中日造园的比较研究,则必有所获益。因此,对于中国造园史的研究而言,日本早期的造园技术专书《作庭记》以及园林遗构,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存只有明清的园子,也已经变了样子。而日本园林可以让我们想象出中国宋园是什么样子,所以是对中国园林史的一个极好的补充”⁽²⁾。其实何止今人,古人早就想通过日本来获得和认识中国本土已失传的文物礼仪制度⁽³⁾。中国古代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正说的是这个道理。

与两千年来丰富多彩的造园实践相比,中国古代造园技术与理论的总结,则显得苍白。即使有那么一些只言片语,也多是依附于画论、山水文学或园记等,从传世的著述看,直至明末,造园理论也始终未形成完整、成熟的独立形态。若不是明末借文人造园家之手,才有唯一的一部造园专书《园冶》传世,那么在完整、系统、独立的造园理论这一

领域上,几乎就成为空白。关于中国古代造园实践丰富,而技术专书缺乏这一独特现象,一方面,或许由于早期专著甚少,未得流传,故还不宜贸然就说先于《园冶》之前,中国古代一定就没有专书存在;另一方面,或如明人郑元勋解释云:“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4〕。这一解释倒也切中造园的本质,同时也表明中国古代造园书之著述与流传极鲜。然造园也并非完全无成法可行、无规矩可依,《作庭记》与《园冶》的出现正表明了这一点。若论造园艺术,与其它的艺术形式一样,断不需作为范本以供后人临摹的园谱之类,来断送造园艺术生动活泼的生命。但若论具体的造园技术,有那么一些关于其成法、规矩的技术专书,也未必就会束缚了造园艺术的创作。《作庭记》与《园冶》的重心,就主要是表现在具体的造园技术内容之上,二者也由此成为中日造园史上光彩的一章。然将造园作为一项专门性技术而论的《园冶》,毕竟成立于中国造园史的晚期,其所总结的也只是明末造园的技术与风格,相比之下,成立于平安时代后期、较《园冶》约早五百年的造园技术书《作庭记》,则显得格外珍贵,别具意义和价值。作为中日早期造园史研究的唯一直接资料,《作庭记》势必成为早期造园史研究的至宝。

《作庭记》与《园冶》作为不同时代的造园专书,各有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若仅从文献史料的角度而言,《作庭记》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造园技术的本身,有一个承前启后、不断积累的发展过程,若以后代造园的眼光求之于前代的《作庭记》,则当然会有差距。但《作庭记》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于今可行的技术内容,其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作为史料的历史价值。故对其价值的衡量与评判,应建立在历史的、文化的标准之上,而不宜以绝对的技术价值来衡量其相对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化、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也正在于此。这也是衡量《作庭记》在东亚造园史上的意义与价值的标准与角度。

《作庭记》不但在造园史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作为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的积累及造园理论的结晶,也影响和指导着日本现代造园的创作与实践,成为日本造园师所必读的课本。《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培育和启迪了现代日本造园的创作,成为日本现代造园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源泉。日本现代的造园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运用着《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和方法,其影响于日本现代造园中随处可见。从《作庭记》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在以《作庭记》为代表的古典造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成为日本现代造园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由此,日本现代的造园,颇具成就而广受赞誉。

对传统造园精髓的汲取、运用及创新,同样也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现代造园的必由之路。因而,《作庭记》对中国现代的造园实践,亦极具借鉴和运用的价值。无论在造园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指导。《作庭记》精辟的造园思想及成熟和丰富的技术手法,对于现代造园的创作与实践,无疑也是一珍贵的财富。

注:

〔1〕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2〕冯纪忠“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的趋势。”《建筑学报》,1990年5月。

〔3〕中国逸书，日本多存。欧阳修特赋诗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见《和钱君倚日本刀歌》诗。

〔4〕《园冶·题词》。值得指出的是，《园冶》逸书的再发现及其完整版本的整理出版，都曾得益于该书在日本的流传并经由现代日本造园界的推崇而反馈到国内学术界的（参见陈植《园冶注释·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二、《作庭记》的内容构成

根据《作庭记》异本《山水抄》的记载可知，《作庭记》是在橘俊纲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集而成的，并且根据《作庭记》中作者的自述：“延圆阿闍梨者，得作庭立石相传之人也，予又得以传其文书”（“立石禁忌”篇），可以推知，在《作庭记》成书之前，似已有一些有关造园作庭的秘传书之类的底本存在，再根据《作庭记》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其中还收录了许多口传、秘诀以及一些相关的文化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作庭记》的内容构成，带有某些汇编的痕迹，正如编著者所言：“不分善恶，悉记之”（“立石禁忌”篇）。相应地，《作庭记》在体裁结构上，也显得并非十分严谨、完整和有序，如出现前后内容略有重复的现象等。

《作庭记》原文，在构成上未设独立的目次，全文在结构上亦无明确的篇、章、节的划分，然其整体的内容构成，依所记述内容的不同，甚明确地分成若干篇，且各篇头，大都设有与其内容相关的提示语、句。依此，《作庭记》整体的内容构成，大致可划分为12篇，每一篇记述的内容不同，份量也各异。《作庭记》的原文，因是以日本假名文字杂以部分汉字构成，故这里以原文的行数^{〔1〕}，来表示各篇内容的份量，并以此分析其内容构成的特点以及各篇在整体构成上的轻重详略。《作庭记》12篇的内容及其所占行数具体如下所示：

1.立石要旨	98行
2.立石诸样	63行
3.汀形诸样	7行
4.岛姿诸样	48行
5.立洸次第	67行
6.落洸诸式	44行
7.遣水事	118行
8.立石口传	57行
9.立石禁忌	157行
10.树事	60行
11.泉事	67行
12.杂部	7行

谷村本《作庭记》分上、下两卷。上卷从第一篇至第七篇，计445行；下卷从第八篇至第十二篇，计348行。上、下两卷共计12篇 793行。正文之后，另有跋语四行。

从以上12篇目所提示的内容可以看出,《作庭记》的内容构成相当丰富,但其文字量并不算多,以行计算,总共也不过793行,以译文的字数而论,约14000字左右。然《园冶》正文内容的文字量,亦不过15000字左右^[2]。故《作庭记》与《园冶》在文字量上,相差无几,大体相当。而在内容构成上,尤其是造园的技术内容,《作庭记》在一定程度上较《园冶》更加广泛、深入和具体。这反映了《作庭记》内容构成上的重技术的倾向和特色。

从各篇所占行数的多少可以看出,第九篇“立石禁忌”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第七篇“遣水事”。造园禁忌内容所占比重如此之大,表现了以《作庭记》为代表的早期作庭秘传书的一个重要性质与特色。此外,由篇目所表示的内容构成可以看出,《作庭记》的造园技术,与所谓的“立石”关系密切。这表现了《作庭记》造园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即以“立石”为中心,强调“立石”作为作庭之基本的特色。

《作庭记》12篇的内容,已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早期造园的主要内容,几乎涉及了造园作庭所有的重要方面及其基本要素。就其造园技术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理石、理水及植栽这三个方面,而独未专门论及建筑。《作庭记》所表现的早期造园,对建筑的形象及其在造园上的景致作用,似未作刻意的追求,人工的建筑与自然的山水,也并未完全地融为一体。在《作庭记》中,建筑并未成为与山、水、植物并列的造园要素之一。

在所论及的造园内容方面,《作庭记》有较《园冶》更为详尽和全面之处。如关于造园理水,《作庭记》所论极详,而《园冶》所论却甚不充分。《园冶》偏重的是掇山叠石,而《作庭记》于理石、理水这两方面,皆极为注重。《作庭记》的造园内容,基本上就是以理石与理水为骨干而展开的。以下就其各篇内容,择要略述于下:

第一篇“立石要旨”,如篇名所示,主要论述造园作庭要旨及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所谓“要旨”,指的是篇首所列举的三条作庭最基本的原则。这三条对于作庭之重要,的确称得上“要旨”。第一条可以说是作庭的指导方针,其精神就是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师法自然。第二条阐述的是作庭既要以传统为范,又要尊重主人的需要,同时还要有自己的风格。第三条强调的是作庭这一艺术创作,犹如博采诸家之花,酿制自己的蜜,其过程须是融会贯通、柔和自然,所谓蜜成花不见。这三条要旨,把握了造园的本质,堪称古往今来造园作庭的要旨,是《作庭记》造园理论的概括和体现。该篇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较具体、详细的论述。主要记述了南庭的设置及其大小的权衡、池中筑岛的方法、岛上乐屋的设置及方法、拱桥架设的位置关系以及作庭理水的测平技术。此外,关于池中立石的处理、中岛岸石的立置以及庭池泄水的方法等,也皆为珍贵的作庭经验之谈。

第二篇“立石诸样”,实际上论述的是作庭诸样,即以庭池表现自然中诸水体的形象与意境,从而形成相应的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及苇手样这五种庭池形式,此为《作庭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该五样中,以大海样最为重要,列于诸样之首。关于诸样的形象与做法,文中所论甚详,且表现形神兼备,颇有趣味。

第三篇“汀形诸样”,是《作庭记》十二篇中份量最小的一篇,仅七行,但其内容

却相当重要。所谓“汀形”，即岸与水的交界轮廓，也即水际线形，它实际上表现和反映的是水体的形象。文中论述了尖如锄锋、凹似锹形的汀形的设计与处理，反映了将汀形设计作为造景内容之一的特色。

第四篇“岛姿诸样”，是关于池中筑岛及其岛形的论述。池上理山，历来被视为园中第一胜景，池中筑岛，在《作庭记》中也同样是最为重要的造园内容。文中将岛形依其性质、形象、特征等分为十种，即山岛、野岛、杜岛、矶岛、云形、霞形、洲滨形、片流、干潟及松皮这十种，并详论及其岛形及做法。岛的类型若大而分之，可成两类，一为山岛，一为平岛。《作庭记》岛姿十种中，前四种为山岛，后六种为平岛。山岛的构成，以土、石堆置；平岛的构成，则多是积沙为洲屿，其岛姿各具特色，别有情趣。就造园对象的形式及其相应做法，分类详尽、细腻，且能传神地把握和表现其特征，是《作庭记》造园技术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五篇“立流次第”，论述了作庭的另一重要内容，即瀑布的做法。其内容包括选石的要诀、叠石为瀑的方法及瀑布两种基本形式离落与传落的做法与特点，并就决定瀑布落幅的因素作了探讨，指出水落之幅唯取决于水落石的宽狭形状。最后描述了令瀑水远望犹似泄出于山岩间而似有深境的方法。

第六篇“落流诸式”，即将丰富的瀑布落式，作详细的分类归纳，并逐一述其形式的特点和做法。其诸式是：向落、片落、传落、离落、棱落、布落、丝落、重落、左右落、横落这十式。就前八式，所论甚详，而后二式，仅提及其名而已。此外，还论及了两点。其一，所作瀑布，须面对月亮，以使水中映月。其二，将瀑布视为不动明王的化身，故瀑布之构石，须仿三尊之姿而置。

第七篇“遣水事”，是《作庭记》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所占份量，居诸篇第二。所谓遣水，即庭上流溪走泉，故此篇即关于庭上溪流的设计与处理，所论极详，面面俱到。择其要者，如关于遣水水源的方位、“顺流”水系的配置，又引经据典，以五行说及阴阳说释之。在论述作庭的水、石关系上，以帝王、臣下的关系附会比拟，得出“凡作山水，必立以石”的结论。并规定了溪流的坡度以及提供了以剖竹仰置于地、流水其中，测定水路高下的简便方法。溪流弯处，受水冲激尤甚，文中论述了置石护岸的方法及布石的艺术。关于遣水浅滩湍流的形象设计与处理，亦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文中还论及了诸如遣水与植栽的配置、遣水幅广的确定等内容。还须提及的是，在无池之庭上，遣水即成为造园景致的主角，而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以上七篇为卷上的内容，从第八篇开始，为卷下内容。

第八篇“立石口传”，根据其篇名可知，即为作庭秘诀、口传的汇集，是丰富造园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其内容主要包括理石的三个方面：一、相石，二、布石，三、具体施工技术。相石是造园理石的基础，文中关于相石的记述，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相石的方法和特色。布石是理石技术的主要内容及精华所在，文中指出布石的原则在于整体上的顾盼呼应、相称协调，并就具体的配置形式，以象形拟物的比喻手法，作了形象生动的阐述。在具体施工技术上，详细记述了加固石根的逐层填土夯实的施工技法。

第九篇“立石禁忌”，与其它诸篇以技术为中心的内容构成相比，别具特色，其注

重的是诸如禁忌、禳解、符镇一类的文化内容,所占篇幅为诸篇之首,表露了《作庭记》作为造园秘传书的性质与色彩。所禁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方位禁忌、位置禁忌及反常规禁忌三方面。该篇中值得注意的内容之一是,在篇尾部分,作者探讨了人作山水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并进行了比较,指出人作山水较自然山水的优越之处在于对景致可作取舍与剪裁,揭示了人作山水的本质所在,是《作庭记》造园理论的又一阐述。

第十篇“树事”,所注重记述的并不是树事的技术内容,而主要着眼于其文化内容,即强调作庭植树在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于庭上各方位植以相应的树木,以为四神具足地。具体方法为,以九柳、七楸、九桂、三榆,分别替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成相应的四神具足地。此外,还记述了门柳、槐门之说及其相应的文化意义。又,以象形解字的方法,判定庭园环境形象的吉凶,亦为该篇的内容之一。

第十一篇“泉事”,论述了泉对于庭园居家之必要,即所谓“去暑以泉最佳”者。本篇所论“泉事”,与其说主要着眼于造景,不如说更注重的是其实用功能,故所记述内容也皆为有关作泉的具体施工技法,如井泉的形式及其做法、掘槽引泉的方法、作喷泉之法,防止井筒泄漏的方法等等。尤其是其喷泉的作法,甚为别致。

第十二篇“杂部”,论述了楼、阁二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并指出其功能上的不同,即“楼以望月,阁以纳凉”。

以上所述,即《作庭记》全书12篇的大致内容及其主要精神。通观全书内容,就理论、技术、习俗、经典等等,皆有详略不等的记述,其中不乏独到、深刻、有味之处。就其内容构成而言,技术内容与文化内容相映,理论阐述与做法描述具备,内容丰富而庞杂。然不难看出,《作庭记》的内容构成是以技术内容为核心与主体的。

作为参考,摘录《作庭记》异本《山水抄》(三卷)的各卷内容构成如下:

上卷:“立石子细”。

中卷:“立泐流水次第”、“造作之事。”

下卷:“立石口传并前栽等事。”

其中,中卷的“造作之事”及下卷的“前栽事”为《作庭记》所没有的内容,其它内容则几乎与《作庭记》完全相同^{〔3〕}。

注:

〔1〕此处所论的内容构成,以谷村本《作庭记》为依据,行数的统计,参照了森蕴《作庭记的世界》一书。译文中的分段起行,依原文意思,于个别处略作有适当的调整、改行。

〔2〕《园冶》的甚多篇幅,为图及所附题词、叙及序所占,其正文内容,也只不过15000字左右。

〔3〕飞田范夫《作庭记からみた造园》。

三、《作庭记》的作者、系谱及成立年代

《作庭记》一书,未署作者姓名,故关于其作者,无从直接了解。就作者何人这一

问题，从江户时代起，就有诸多议论，并曾一度认为，《作庭记》卷末跋语中提及的后京极殿（藤原良经）即为其作者，然诸多研究否定了此说。日本学者根据《作庭记》原文中作者的一段自述，即：“高阳院殿修造之时，能作庭立石者皆失，偶有招来之人，亦全不合心意，故宇治殿（藤原赖通）躬自筹画作庭。其时予常往之，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立石禁忌”篇），并以此作者自述为线索，结合历史上高阳院修造史实的研究以及《作庭记》异本《山水抄》的研究，得出其作者即为高阳院主人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的研究结果。

橘俊纲（1028~1094）为藤原时代高官藤原赖通之子、藤原道长之孙。藤原时代，在政治文化上是藤原氏一族兴盛的时代，其鼎盛时期即为藤原道长当权之时。橘俊纲的祖父藤原道长（966~1027），以其女儿立为皇后，自己作为外戚而摄政，独揽大权，由此迎来了藤原氏一族的全盛时代。1017年让摄政位于其子藤原赖通（992~1074），藤原赖通作为其后三代天皇的摄政、关白^[1]，维持着道长以来藤原氏族的全盛势力。作为藤原赖通宅邸的高阳院，是藤原时代寝殿造宅邸庭园之最重要者，代表着藤原时代造园的最高水准。而此高阳院的修建及藤原赖通亲自筹画作庭之事，在《作庭记》中的作者自述中，亦有提及。作为《作庭记》作者的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在此高阳院修建之时（1040年），年纪尚小，然随父藤原赖通常出入于营造现场，而“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这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对橘俊纲其后《作庭记》的著述，无疑甚为重要。

橘俊纲的一生，正处于平安时代的中后期，也正是寝殿造庭园成熟及兴盛的时期。作为其时上层贵族的一员，橘俊纲对这一时期的寝殿造宅邸庭园及其营造不仅有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而且“犹好此道”（《山水抄》）。《尊卑分脉》称其：“号伏见修理大夫，水石得风骨”；^[2]《中右记》赞其伏见宅邸：“件处风流胜他，水石幽奇也”。^[3]由此可以想象橘俊纲对造园作庭的兴趣及才能。优裕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亲身的体验与感受，成为橘俊纲编著《作庭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关于《作庭记》的版本问题，现存的诸本均为抄本或异本，《作庭记》的原本不存。现存诸本中较主要的有谷村本、彰考馆本、群书类丛本及《山水抄》等。在诸本中，以谷村本的年代最早。其卷末跋语中记有“正应第二”的年号，可知此抄本跋语年代为镰仓时代中期的1289年。该抄本明治时代以后为谷村家所藏，故称“谷村本”。此本为诸本中最重要者，昭和11年（1936）被指定为国宝^[4]。

彰考馆本，为彰考馆所藏之抄本。日本宽文12年（1672）由菊池东匀写成，题名“园池秘抄。”其内容与《作庭记》完全相同，并附有抄者菊池东匀所作《园池秘抄引》，甚为珍贵。

群书类丛本，以谷村本为底本，江户时代塙保已一编集古文献丛书群书类丛时，将其收录，是为群书类丛本。

异本《山水抄》，其内容与《作庭记》几乎完全相同。据其卷末记事可知，《山水抄》系依橘俊纲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编集而成，编集者为庆算法印，成立年代推定为13世纪初。由此似可以认为，橘俊纲的园事日记是《作庭记》最初的原本或雏型。

《作庭记》原本的成立年代，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考证，可上溯至12世纪，具体地

说,其成立年代当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后半之间^[5]。

《作庭记》的书名,诸本并不一致。现通行的“作庭记”一名,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之后才出现的。尤其是在群书类丛将之以作庭记题名收录之后,其名才逐渐广为世人所知。

《作庭记》在流传转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题名,而据推测,此书最初可能无题。因此,在流传转抄过程中,才会出现因抄者对之理解的各异,而采用不同题名的现象。这些不同的题名是:前栽秘抄、园池秘抄及作庭记,而以其中的作庭记一名最为通用。

“前栽秘抄”一名,最早出现于镰仓时代的《本朝书籍目录》^[6]中。所谓“前栽”,指以草本、小灌木为主的低小庭上植栽。当时似又以此“前栽”一词,代指庭园整体,所谓的“前栽秘抄”,实即“作庭秘抄”之意。

“园池秘抄”,为彰考馆抄本的题名。此题名似为抄者菊池东匀对其无题底本所加之题名,故有彰考馆的吉弘元常对此《园池秘抄》抄本于1685年所作的如下跋语:

“此书原名作庭记,或曰本朝旧书目所载前栽秘抄者是也。宽文十二年(1672)冬,菊池东匀借清水宗川藏本誊写,加书跋妄改为园池秘抄,今宜复古以为作庭记焉。”^[7]

虽说抄者菊池东匀之题名,有“妄改”之嫌,然此“园池秘抄”题名,无疑在内容及性质上,最为贴切于原著,可见菊池深得其味。

“作庭记”一名,最早出现于日本宽文6年(1666)号柳谷者的著书中,其次即上文提及的《园池秘抄》吉弘元常的跋语中。至1793年塙保已一将此书以作庭记名收入所编群书类丛游戏部中,作庭记一名从此为人们所接受和习用。

《作庭记》一书在流传过程中,还为其它一些书籍所摘录、引用。如室町时代一条兼良所著《尺素往来》(1481)中,即出现有与《作庭记》极为类似的内容。其虽未注明所引用文之出处,但经比较可以看出,当引用和摘录于《作庭记》。其内容对于《作庭记》的考证研究,亦具参照和比较的价值。在此将其引用的具体内容摘录于下,以供参照比较:

“先为庭上之景,庄严前栽仕候。假山水者,海样、河样、池样、泉样、遣水样、岩井样、细谷川样、枯山水样、山形、野形、洲滨形、苇手形等。

立石者,海川石、野山石、流波石、水分石、逃石、追石、添石、离石、起石、卧石、鸕羽干石、鸳鸯并居石、三尊形石、品文字等。

洸落者,丝落、布落、离落、单落、重落等^[8]”。

还值得提及的是,菊池东匀所作的《园池秘抄引》,在《作庭记》的研究上也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作庭记》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是一篇难得的有关造园理论的阐述。引文还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透露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情调以及反映了中国造园思想的深远影响,甚为珍贵,特引全文于下:^[9]

园池秘抄引

园池秘抄一卷,不著作者姓名,本朝书目亦所不载。意是后朱雀、后三条间人所作也。大抵皆记园池造筑之法,而出入浮图之遗说,如其谓以山为君,以水为臣,以石为

辅佐，山无石则为水所冲激，君无辅佐则为臣所侮慢，君得辅佐以保天位者也，故筑山水者，必先立石为务者，亦是有味之言也。而知本之论乎，盖自路子工构南庭须弥，世人皆知假山水为乐，设为园池，以为清玩，如橘太后之淳和院、源相国之河原院，山貌叠嵩，岸势缩海，虽彼崑阆，何以加之。特非一时文人之夸说，实是千载之美谈也。夫山水者，天下之大物而天下之壮观也。若富士筑波松岛桥立者，天下所同珍，而使是移在于中华之中，亦所谓最余杭而甲灵隐者也。且人情之所欲观者，不在乎寻常丘壑之间，而在乎夫天下所同珍者。而思欲以一撮一勺之功，庶几乎其巍巍洋洋之势，岂不难耶。然造园池与绘事同，画人能得其粉本，则片楮半绢之上，广图五岳四渎之形，一笔一墨之下，备分远近高下之势者也。此书自池沼岛屿之形状，飞瀑悬泉之态势，屋宇台榭置设，门户道路开通，树木向背，骈石卧起，而至于阴阳地理，宜禁吉凶，委曲纤悉，莫不并举兼录，殆是园池家粉本也。因是为之，则夫跨三州之山、降二神之岭，可以能叠，四百八之奇岛、百八里之长渡，可以能成，而凡天下所同珍、而人欲观者，皆能咄嗟而辩，有使人各得其登临之志愿者也。于是摩诃之辋川、龙眠之山壮图，皆不是多，所谓竹不如肉者也。余初写此书，为帐中之物，顷日又得二乐轩宗世亲笔本，交互勘会，定成一本。其素蠹灭，皆阙不补。因读而叹曰，在昔净名居士十笏室内，容三万八千狮子座，不知者犹为眩，而今我三尺几上，江湖山川，台榭木石，罗列纷布，无不有焉。比于净名居士，亦为甚大。然则是书与造化争衡者，而非我家无尽藏耶，遂书为引。玄默敦阳复月。

耕斋主人菊某

注：

〔1〕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外戚藤原氏掌权。当天皇年幼时，太政大臣主持政事称摄政，天皇成年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天皇无实权。

〔2〕《尊卑分脉》，成立于日本南北朝（1336～1392）末的诸家大系图。

〔3〕《中右记》宽治7年（1093）12月24日条记事，转引自飞田范夫《作庭记からみた造园》P.134。

〔4〕此处的“国宝”，为二次大战前所指定者，是日本文化财中，文化史价值最高者的指定和保护名称。二次大战后，日本重新修改了指定标准，改定为重要文化财。

〔5〕飞田范夫《作庭记からみた造园》。

〔6〕《本朝书籍目录》，为日本古代图书目录，成立于镰仓时代（1185～1333）中期，是现存最早的日本书籍目录。

〔7〕转引自田村刚《作庭记》P.168。

〔8〕转引自森蕴《作庭记の世界》P.190。

〔9〕转引自田村刚《作庭记》P.166。

四、《作庭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为东亚造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古代造园，其早期造园技术书《作庭记》的出现，有其深刻和广泛的历史背景。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作庭记》的性质

及其内容,有必要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至平安时代后期,日本造园发展的性质及过程——作一番考察。众所周知,日本的造园体系渊源于中国,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中国的影响,日本造园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造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作庭记》历史背景的考察,则有必要从东亚造园体系的形成开始。

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这三大体系。东亚造园体系又以中国为核心和代表,包括朝鲜、日本等东亚诸国在内,几千年来,其发展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而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造园最典型的代表和象征。

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以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为发源地的中国文化,向东扩展的结果,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东亚中国文化圈,其中尤以中、日、朝三国的关系最为稳定、密切及最具代表性。这一东亚中国文化圈的特点是,以汉文化为基调,在文化的诸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共通性,在文化的发展及演变上,带有系统的整体性及连动性。作为子系统的东亚造园体系则亦然,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以中国造园艺术的内涵为情趣和意境所在。要之,具有统一的造园原则及一致的审美情趣。当然,各民族的造园艺术,还有其独自の个性,尤其是日本的造园艺术,在汲取与发展的过程中,其民族特色,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不同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造就了日本造园艺术的独特气质与风格。可以说,日本造园的发展,是中日造园艺术的复合与变异。

佛教文化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与纽带,同时也是中国造园艺术在东亚传播的载体。中国造园文化对周边诸国的影响与传播,正是随着中国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而展开的。东亚造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东亚诸国间的佛教文化交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对日本而言,随着中国佛教的传入,给日本带去了高度繁荣的中国文化,造园艺术即为其一,直至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园林的影响才进入日本。

在东亚,中国佛教先是进入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再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相应地,中国造园文化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三国,先于日本接受了中国的造园文化,并成为中国造园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桥梁。

三国中的百济,其造园似较为发达。《三国史记》^{〔1〕}百济本纪中,即记录有几次造园活动。如第十六代辰期王(385~392)御苑、第二十四代东城王(479~501)御苑及第三十代武王(600~641)御苑。其中武王之御苑尚存留有遗迹,即百济都城扶余宫南池遗址。对此御苑,文献中有如下记载:“穿池于宫南,引水二十里,四岸植以杨柳,水中筑岛屿,拟方丈仙山。”^{〔2〕}

三国之一的新罗,造园亦盛。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新罗文武王离宫:“宫内穿池造山,种花草,养珍禽奇兽”。^{〔3〕}其园池遗址今仍存,即称雁鸭池者。经遗址发掘,园池甚广,中置三岛,亦为一池三山的池岛造园形式。

朝鲜三国时期的造园,在性质与形式上,大体摹于秦汉苑囿,表现了秦汉造园的遗风及其影响。秦汉苑囿以池模海、池中仿筑海上仙山的一池三山的造园形式,成为朝鲜三国时期造园的起点及基本形式,并成为其后整个东亚造园体系的基本原形之一。

中国造园对日本的影响，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上三国中的百济而产生的。百济的文化，对飞鸟时代的日本产生过强烈的影响，百济的工匠、画师等多有渡海至日本者。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20年（612）条记载：“是岁自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癩者乎。恶其异于人，欲弃海中岛，然其人曰，若恶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马不可畜于国中，臣亦有小才，能构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则为国有利，何空之弃海岛耶。于是听其辞以不弃，仍令构须弥山形及呈桥于南庭，时人号其人曰路子工”。这位被称为路子工所具有的“小才”，正是从中国传入百济的造园技术。

日本文献中所出现的关于中国系统的造园的最早记事，见于《日本书纪》武烈天皇8年（506）3月条：“及是时穿池起苑，以盛禽兽，而好田猎，走狗试马，出入不时。”这从形式与内容上，都承的是秦汉以来苑囿的体系。如果这一记载真实的话，那么则标志着中国造园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已达至日本。然据日本学者的推测，此武烈天皇记事，似并不那么真实可信〔4〕。

随着佛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从大陆传入日本的造园文化，才真正显著地表现了出来。取法中国的造园形式，日本的造园迅速地发展起来，中国以池、岛为骨干的庭园形式，在飞鸟时代的日本已基本确立。《日本书纪》推古天皇34年（626）5月条，关于苏我马子邸宅园池有如下记载：“家于飞鸟河之傍，乃庭中开小池，仍兴小岛于池中，故时人曰岛大臣。”这已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宅园形式，作为中国式山水园的基本构成要素——池、岛，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已趋于成熟。

奈良时代（645～780）是日本竭力吸收唐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日本灿烂古典文化的繁盛时代。根据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程度之大即不难想象，在造园上奈良时代亦深受唐代的影响。奈良时代的造园分皇室的官苑与贵族的宅园这两类型〔5〕。其造园的形式与风格是以模仿唐代为特色，这也是当时上层贵族渴求唐文化心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从现存的一些诗文记述中，亦可看出这一特色。题为“春苑应诏”（《怀风藻》）的诗中，这样描述了当时官苑的景象：

水清瑶池深，花开禁苑新。戏鸟从波散，仙舟逐石回。舞袖留翔鹤，歌声落梁尘〔6〕。

诗中流露出浓厚的唐文化色彩及情调，并从中可窥见唐宫苑池岛林泉的面影。同时宫苑中所行的各种娱乐游戏的内容，亦十分中国化，如有端午、七夕、冬至诸宴游，及赋诗、奏乐、相扑、骑射、走马、蹴鞠、曲宴等〔7〕。

如同唐代两京长安、洛阳城内，公卿贵戚的宅园遍布一样〔8〕，日本奈良朝的平城京上，贵族第宅庭园亦盛，成为奈良时代造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诗文的描述来看，其形式及风格、情调，与唐代的都城宅园亦无两样。其构成也不离构山穿池、置石引流、植竹栽花。如“构微岫于庭际，引细流于堂垂”（《小山赋》）、“竖山穿沼，植竹栽花”（《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及“西园开曲席，东阁引珪璋。水庭游鳞戏，岩前菊气芳”（《晚秋于长屋王宴》）等，都是对其宅园的描述〔9〕。

除文献以外，近年来日本对平城京所进行的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一些庭园遗址，这又使得对奈良时代庭园的面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平城宫东院庭池遗址上，发现有益于流杯的曲水及庭池的遗迹。庭池为前后二期遗址的重叠，其构造做法及石组形式，